

305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多情父亲

——戴高乐传

〔法〕查尔斯·威廉斯 著

孙洪兵 译



A1002500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逐鹿中，每个大国都涌现了政治强人，美国是罗斯福，苏联是斯大林，英国有丘吉尔，法国则出了戴高乐。

戴高乐出生于1890年，父亲是一位文学教师。起初他的学业成绩并不出众，他比较懒惰且反应迟钝。15岁时他才开始用功，成绩也随之扶摇直上。1901年戴高乐进入圣西尔军校学习，开始了他几十载的戎马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奔赴前线，1914、1915年他两度负伤，1916年他所指挥的步兵第10连被全歼，戴高乐上尉受伤后成为德国俘虏，直至一战结束时他才获释。

三十年代戴高乐著书立说，显示出了他是一个目光敏锐、切中时弊的军事理论家。他在法国首先提出了坦克战、运动战的思想，可是他的远见卓识竟为固步自封的法国军方上层所拒绝。正是军方上层这种保守不求进取的思想，导致法国在希特勒军队坦克战、运动战面前一败涂地。戴高乐亡命英伦，此时他已50岁，仍默默无闻。

但历史注定要戴高乐承担拯救法国尊严的重任。二战中他所指挥的部队在军事上对战争努力所做的贡献均属外围和边缘性质，对二战的最终胜利无足轻重。他一直拒绝接受别人的好言相劝，不愿像波兰人、捷克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那样建立一支由英国指挥机构调遣的部队。他坚持向人们表明，法兰西

并没有灭亡，仍在英勇奋斗。他沿这一行动路线前进的倔强精神曾遭到了诸多艰难，其中包括英美等大国的刁难，但正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努力与抗争，成功地纠正了1940年法国崩溃以后许多人对法国所持有的蔑视态度，也成功地使他的国家在战后恢复了世界五大强国的地位。

1958年，戴高乐在“休眠”十年后东山再起，他建立了第五共和国，担任总统，使国家免于陷入内战，他还在国际舞台上穿梭奔波，大大提升了法国的国际地位。1969年戴高乐下野，隐故故里，次年去世，享年80岁。

身材高大的戴高乐将军极富个性，他精力充沛，勇于斗争，他向来我行我素，固执己见，得罪了不少权贵。在政治舞台上他有着狮子一样的铁石心肠，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他又是一个慈爱多情的父亲。他对自己的残疾女儿安娜万般呵护，关怀备至。1948年正值青春年华的安娜不幸早去，将军泪流满襟，要求死后葬在女儿身边，与她相伴于九泉。生前他就立好遗嘱，不要国葬，不要悼词，悄悄地去正如悄悄地来。

本书作者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对哲学、文学都有较深的造诣，他曾撰写过《胡志明传》、《西哈努克传》，他写的传记带有相当浓厚的哲学意蕴。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部 童 年	(1)
学校生活	(1)
第二部 军 人	(3)
共和国的陆军	(3)
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	(7)
波兰插曲	(10)
贝当的小鸡	(11)
涉足政界	(13)
镰刀行动	(14)
他是第二个拿破仑吗?	(18)
第三部 流 亡	(21)
奠基	(21)
非洲的阳光泉	(23)
鹰、熊参战	(27)
全线抵抗	(32)
地中海风暴	(40)
达尔朗交易	(46)
从昂法到阿尔及尔	(51)
打败政敌	(62)
等待霸王行动	(76)

谁为法国赢得了这场战争	(85)
第四部 英雄	(93)
巴黎之夏	(93)
政府必须大权在握	(107)
将军之战争的结束	(120)
第五部 政治家	(134)
权术政治随和平而至	(134)
一搏而不中	(146)
第六部 思想家	(163)
关于法国的某种设想	(163)
人前人后的戴高乐	(166)
第七部 国家元首	(169)
将军复出	(169)
“我理解你们”	(186)
阿尔及利亚并不属于法国人	(200)
新的议程	(210)
天高任鸟飞	(216)
捉弄山姆大叔	(221)
5月15日	(229)
终局	(241)
跋 回到科隆贝	(252)

第一部 童年

学校生活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降生，他的父亲在巴黎一所中学当教师。

1895年10月，不满5岁的夏尔上学了。管理学校的是一个名叫圣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兄弟学校的宗教团体。

有关戴高乐在他第一所学校度过的5年里学业上或其他方面的活动，现在是一无所知。不过他在此收获不小，继他更加聪明的哥哥格扎维埃之后，成为知名的纯洁受胎耶稣会学校的一名学生。这所学校位于沃吉拉尔街，离巴黎斯达艾尔街戴高乐的家非常近。

进这所学校时，戴高乐才10岁。按照学校安排，他应当集中精力熟练掌握拉丁语入门和希腊语的最基础知识。两年后，他应当掌握所有拉丁语法，而且能够背诵西塞罗、凯撒、昆图斯·库尔提乌斯以及奥维德的部分诗作，伊索和卢奇安的作品选集和修订本。14岁时他应当达到完全掌握拉丁语习语的目标，具备阅读萨卢斯特、李维和维吉尔作品的的能力。在希腊语方面，他应当学习色诺芬、圣约翰·克里索斯托，普卢塔克，特别是圣巴西勒的论文“论异教徒作品的阅读”。与此同时，他还要学习修辞学，这门课目的是以西赛罗、狄摩西尼和圣约翰·克里索斯托为样板，培养学生“杰出的雄辩才能”。还

有历史，重点是圣女贞德和法国的传教活动。最后是哲学和教义问答手册。

戴高乐的学业成绩最初并不突出。据他父亲讲，他不勤奋，反应也不敏捷。只是在遭家人批评之后，在 1905 年决定从军时，夏尔才把他的聪明才智用在了学习上。结果在 1906 年他脱颖而出，一鸣惊人，拿了 6 个第一名，其中有法语作文、数学、历史和地理。

第二部 军 人

共和国的陆军

在动荡不安的 1909 年 10 月，19 岁的戴高乐以最低的身份加入了步兵第 33 团，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营地在法国北部的阿拉斯。

在军队的第一年，戴高乐过得并不愉快。他聪颖、腼腆，身高 6 英尺 5 英寸，自然成了战友们开下流玩笑的对象。他们取笑他，殴打他，常常使他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在这位过分讲究的耶稣会学校毕业人面前大讲淫秽下流的大兵语言。

1910 年 10 月 14 日，年轻的士官生夏尔·戴高乐冒着大雨步入了圣西尔军校，这是一所专门培训法国军队中有抱负的高级军官的特种兵军校。来校前，戴高乐认为自己来到了避难所，然而他在阿拉斯所经受的痛苦和欺凌在圣西尔并没有结束。他身体上的特点被在士官生中很常见的光头衬托得更明显，鼻子和耳朵显得更加突出。大家给他取了不雅的绰号“大芦笋”、“土耳其公鸡”，让他躺下用“西瓜公里”量院子的宽度，也就是说用他的身体的长度测量。

在圣西尔，早晨 5:30 起床，6:00 吃早饭；然后学习到 7:00，再练两个小时体操，击剑和马术。接着又是学习，直到吃午饭，下午学军事课到 4:30，然后自习到 7:30。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9:00 点名，10:00 熄灯就寝。像在沃吉拉尔耶

稣会学校一样，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

1912年9月，戴高乐以少尉的军衔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所修课程除了步枪、射击、马术和击剑外均为良好。他的步枪射击糟透了，但他的总成绩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尤其是实际野战工事，“品德教育”和“对疲劳的忍耐力”方面他表现非常突出。他最后的成绩虽不是优秀，但对于他所选择的希望被分派去的团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尽管他生长在北方，尽管他与他们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他仍决定回到他曾当过步兵的第33团，做一名已被任命的军官。

戴高乐之所以回到阿拉斯可能是由于该团新任指挥官菲利普·贝当的原因。贝当曾在高级军校——当时的参谋学校做过教官。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绝不是个贵族。作为一名杰出的教官，贝当有很高的声望。不仅如此，他还以坚持己见而驰名。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谁主动出击，而是谁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火力。当时的高级指挥官十分重视他的这一观点。

贝当那时56岁，在这个年龄通常该退下去了。但他仍精力充沛，严峻的脸上一双蓝眼睛，目光锐利，头发稀疏，剪得很短，看上去魅力十足。在阿拉斯的施拉姆营房里，他和新来的少尉简短地互相问候，说欢迎他到“陆军”来，似乎他早期军事生涯所经历的一切在严格意义上都与组建陆军无关。

戴高乐少尉被委派负责指挥一个排士兵。他从前和他们一样。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疲惫而且郁闷。他立刻开始给士兵们上课，讲责任和义务。这是一名新任排长通常所要讲的内容，也产生了通常所产生的枯燥。不同于当时以及现在的许多排长的是，这位排长研究并记住了每个士兵的生活细节，多得连士兵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部队每年都要进行“对抗演习”。其目的不易察明，只像

是要让年轻人有事可做。当然，这里不存在保密问题。在1913年的对抗演习中，出了一次严重的伤亡事故。德国使馆武官冯·温特费尔德上校的车在观察演习途中翻下路面。这种舞台式的表演如何能训练参加者，使他们在战争一旦爆发时表现得更好，同样不甚明了。它是确定下来的例行公事的一部分，不宜公开讨论。

1913年秋季演习的高潮在西南部图卢兹附近平坦的农村展开。它实际上是整个法国军队参加的模拟战争。人们认为演习在那里举行旨在把德国事件所引起的愤怒降低到最小程度。整个演习展现出全面战争的威武与壮观，裁判不断宣布整个排被消灭、整个机枪阵地被炸飞。演习搞得这样好，连德国皇帝也感到很高兴，并给法国总统写了封长信。实际上，仅在几个小时后，他告诉正在柏林访问的比利时国王，他对法国人感到厌烦，决心“以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干掉他们。这令人不安的消息最终传到了巴黎，至少法国政府意识到欧洲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舆论自然不再是和平主义的了。到1910年，德雷富斯事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逐渐消失，强烈而鲜明的被称为新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又抬起头来。激进分子对政府感到失望，他们要通过确认爱国主义甚至战争情绪的价值来拯救自己的命运。1911年，一位激进派代表甚至说，“当枪炮开始讲话时，政治家最好保持沉默。”摩洛哥一系列的危机使政治气温持续升高。同年，59岁的若弗尔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这一迹象表明需要新思想。

一个已经怀有这些新思想的团就是阿拉斯的第33团，这要感谢其指挥官贝当。这个团纪律严明，训练内容更新，士气十分高涨。到1913年底，当贝当离开该团去当旅长时，33团的军官们知道战争即将爆发，他们已做好了准备，至于怎样打

和为什么打还不清楚。冬去春来，转眼又到了1914年的夏季。他们知道唯一明智的行动就是坐下来等待，无任何其他事可做。

贝当的离去削弱了33团的指挥机构力量，但是他给年轻的戴高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高乐于1913年9月晋升为中尉。贝当感到自己的事业已到了尽头。他一直是惹事生非的人，不停地抱怨，公开尖刻地批评高级指挥的愚蠢，因为他们不做思索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战略思想。在被提升为旅长的时候，他听说国防部一位高级军官说他绝不可能成为将军。他甚至做好了退休准备，在加莱海峡省圣欧梅附近买下了一所小房子。

当然，事态的发展改变了贝当事业的轨迹。团长给戴高乐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说：“贝当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贝当为何对这个年轻的中尉也有印象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具有当时的军官们所不具备的特点，它比戴高乐后来所认识到的还要多。他们都来自北方：贝当来自皮卡底，戴高乐来自弗兰德。他们都受过天主教的教育。贝当进的是多明我教会学校，戴高乐进的是耶稣会学校。最重要的是，贝当在戴高乐身上发现了一个骄傲的战友，反抗着他周围的平庸之辈。

就目前所知，两个人在1913年下半年到1921年间未见过面。在这8年间世界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剧烈地震撼着。即使在那么长时间之后，尽管在战争中他们各自有截然不同的经历，当时已是法国陆军元帅的贝当，全力提拔曾经被俘的戴高乐上尉。可见他们两人1913年在阿拉斯时的关系比历史所记载的要密切得多。在他们之间长期的关系中，没有丝毫哗众取宠的地方。

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

1914年8月1日法国颁布了军队总动员令。当天下午大约4:30,消息传到阿拉斯陆军第33团指挥部。大家欢呼雀跃。后备役军人赶来了,一些逃兵要求重新入伍。部队开始为奔赴前线进行战前准备。8月3日,德国宣战。8月5日,陆军第33团从阿拉斯出发先期到达比利时边境一个叫伊尔松的地方,加入第一军团开往比利时,在迪南占领阵地,保卫默兹河上的大桥,挡住正从比利时进入法国的德军。部队出发前举办了愉快的告别宴会。同众多要上前线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的年轻人一样,年轻的中尉戴高乐也是热情洋溢,渴望炮火的洗礼。他写给母亲和姐姐的家信反映了1914年人们可悲的天真:“部队极其出色……我们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然而,现实很快就展现在他面前。8月13日,第一军团刚刚穿过前线进入比利时,一架德国侦察机就飞至他们上方盘旋。法军夜行军走了50多英里,赶在敌人前面到达迪南。就在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到达目的地,安定下来休息时,德国大炮开火了。时间是清晨6点。

德国机枪手和步枪手从河对岸的堡垒上,展开猛烈的攻击,顿时就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法军大炮来得太迟,33团没有保护,戴高乐的排设法寻找藏身之处。作为11连的尖刀排,他们奉命坚守大桥,阻止敌人通过。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戴高乐率领全排奔向大桥。就在他上桥的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膝盖。他倒下了,副排长倒在他身上阵亡了。戴高乐躺在那里,听到“子弹射中周围倒在地上的伤兵和死尸发出的单调的砰砰声。”他竭尽全力终于

爬起来，和 11 连所剩下的残兵，在迪南一个友好人家躲避起来。这时，法国大炮才开火，可是已经太晚了。

通过一段身体治疗，1914 年 10 月，康复后的戴高乐重返步兵第 33 团，来到雷姆附近的前线。

此时，地面上的战斗开始转入战略僵持阶段，后来发展成可怕的堑壕战。

1914 年 12 月，戴高乐中尉被任命为 33 团团部的副官，有权直接向团长报告。此时，全团向南开往马恩河畔夏龙占领阵地。1915 年 2 月，戴高乐被提升为临时上尉。离开了前线，新任上尉感到平静多了。

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堑壕双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伤亡惨重。1915 年 2 月 10 日到 3 月 10 日之间，法国共损失了 19 名军官和 700 多士兵。其中有 4 名军官阵亡，13 人受伤，2 名不知下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受伤的军官中有新提升的上尉戴高乐，一块弹片炸伤了他的左手。他坚持到 3 月 10 日，伤口开始感染。

出院后，戴高乐于 1915 年 6 月回到 33 团。这时部队已向北到了埃纳河边的前线。上尉的军衔被批准了，其任务还是持久、残酷的堑壕战。从 1915 年 6 月到 1916 年 1 月，第 33 团既不是正规军也不是预备部队。

1916 年 2 月中旬，德国人在南部向凡尔登突出的地方发动猛攻，此处法军防守并不牢固，双方一次又一次发起毫无希望的自杀性进攻，却只夺得不到几码的阵地。奥蒙的堡垒于 1916 年 3 月被德军夺去，1916 年 10 月又被法军重新夺回。这几个月里，堡垒附近激战不止，伤亡难以计算，死尸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使堑壕都没法挖，这场血战持续了 10 个月，成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一战。

第 33 团被派到离堡垒半英里远的奥蒙村教堂附近的防区。

3月2日清晨6:30,德国人开始轰炸。其炮火异常猛烈,以至大地像在地震一样震颤。中午,德军步兵在烟雾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双方伤亡惨重,一个法军阵地失守。在肉搏战中,一支法国部队被围困,被迫投降。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就是戴高乐上尉。他的左腿被刺刀刺伤。可能当时他并没有失去知觉或神志不清,只是巨烈爆炸声或刀伤的痛苦使他昏了过去。

那时,步兵第33团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三天的战斗中,60%的官兵非死即伤,不再能据守从弗勒里村通往杜奥蒙教堂的小路。包括戴高乐在内的受伤的战俘,被从阵地送到美因茨的德国军队医院。戴高乐在那里得到了医治,不到10天就痊愈了,然后被转到尼斯的临时营地。

在尼斯,戴高乐策划了第一次逃跑计划。他想从多瑙河坐船到黑海。计划轻而易举地被人发现,参与者被解送到立陶宛的什祖青禁闭营,那是一座旧锯木场。

监禁的两年多里,戴高乐多次策划逃跑,但最终都未能完全成功。1918年11月,停战后三个星期,他穿过瑞士边境,经日内瓦、里昂和巴黎,于12月上旬到达拉利格里。他父亲召集全家人迎接他。

战争快收场时,戴高乐上尉开始对自己做出评价。结果不太乐观。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在这场罕见的最伟大的军事冒险中,他错过了不少机会。他在战场上是勇敢的,甚至有些莽撞,但却没有赫赫战功。1918年9月他从监狱给母亲写的信中,曾对此失望地叹惜。他说要离开军队,因为他看不到战争所带来的变化,并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前途。

然而,作为战俘的几年也磨炼了他的品格,这些品格对他未来的生活将有深远影响。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机智,甘愿受罚而不抱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监狱的枯燥生活中,对战争的性质和领导人他也做了深入的思考。他在给难友们讲

课中表现出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智慧与他日后的演讲和写作是相同的。人们怀着敬畏之情和浓厚的兴趣倾听他的演讲。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狱成了他的大学，他在那里学会了思考，深入地思考。圣西尔羽毛未丰的军官候补生，迪南桥上莽撞的排长，已成为过去。

波兰插曲

以极大兴趣密切注视这一切的军界显然已看到，戴高乐上尉受到法国元帅的特别保护。他进高级军校只是时间问题。1921年12月，戴高乐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出生了。他们只好搬到更宽敞的住所里去，离元帅和妮妮远了。这时还有进入高级军校的入学考试问题，但这两者均不构成严重障碍。虽然贝当由于婚姻状况而不能成为教父，但却对这位年轻人有种像叔伯式的态度。这位小伙子像他一样，也叫菲利浦，这当然纯属巧合。考试不是考查想象力和良好感觉，而是考纯粹的学术能力和记忆力。这对于耶稣会学校学生出身的戴高乐来说丝毫不成问题。

1922年5月2日第44届被高级军校录取的129位候选人名单公布了，上面自然有戴高乐的名字。如果从前人们有过怀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戴高乐被认为是法国军队头号掌权人的追随者，而且是最得意的门徒。这种关系持续了近6年，却将在痛苦中结束，最后酿成了悲剧。

贝当的小鸡

1922年，戴高乐被高级军校录取了。此时人们认定戴高乐是法军头号掌权人贝当元帅的追随者，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但在一个伟人的保护下并非只有幸福。戴高乐马上被他在高级军校的同学们视为贝当“宠爱的小鸡”。

在军校，戴高乐越来越不讨人喜欢，因为他坚持要纠正老师的错误。他还被认为不务正业，傲慢自负。1924年3月，在得到军校的毕业证书前，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对敌作战》，研究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这是他应当在高级军校学习的题目。无疑这是对军校权威的嘲讽。

到审议毕业证书时，问题出来了。显而易见，戴高乐绝不是一般的学生。用任何一种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各科成绩都不错，只有马术成绩在平均线以下。但是考试委员会不得不考虑到他傲慢无礼的态度。无论一名军官多么聪颖，如果各个级别没有严格纪律，军队将不堪一击。而一名军官要想让他的下级严守纪律，他自己必须以身作则才行。

给戴高乐一个什么成绩才恰当，这让人很为难。贝当的宠儿是不能不及格的，而及格分为三等，一种是“还好”，等于说勉强过得去；一种是“好”，表示不好也不坏，通常给那些学习刻苦，成绩却不突出的学生；还有一种是“很好”，给那些在考官看来将会在法国军队中任高职的学生。有些教师同意只给戴高乐“还好”，那简直就是一种羞辱。贝当听说后，询问此事，在新任军校校长迪菲厄的坚持下，给了一个中等，即“好”。

戴高乐对这一成绩极其不满。他发誓除非他当校长，否则

永远不再到这里来。他用丰富的语言来形容导师们，骂他们是白痴，这并非没有道理。

戴高乐在高级军校的成绩对他的未来立即产生了不利影响。他曾想留校任教，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军官是没有机会获得教职的。同所有毕业生一样，有关部门给他安排了一个参谋职位，当然他不能进入总参谋部。那里只有优等生才能进去。他的工作是负责军队司令部的厨房设备和冷冻食品储藏。几个月后，他被调到莱茵河法军参谋部，总部设在美因茨，同样负责供给和食品给养。那里相当于法军中的西伯利亚。

1925年7月，离开高级军校9个月后，他终于被贝当救了出来，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做私人参谋。戴高乐喜欢这个职位。他工作勤奋，效率很高。

1927年12月，戴高乐赴德里的特里尔，任驻扎在那里的法军阿尔卑斯山第19步枪营营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戴高乐对训练抓得很紧，指挥官对手下的人实行家长式的监视。戴高乐记忆力惊人，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下级军官们的家庭历史和现状。

但是作为营长，戴高乐少校并非没有缺点。他的一位军官后来说：“他很突出，不是因为他的身材，而是因为他的自我意识，从远处也能见到它闪闪发光。”可以想见，他和上级又相处得很不融洽。他不乐意地从他们那里接受命令，拒绝接受他们的批评。

结束在德国的营长任期后，戴高乐被派到贝鲁特，做驻黎凡特法军总司令德比戈·德·格朗德鲁的参谋。

1931年11月，戴高乐少校在黎凡特的两年任期满，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也许又是贝当的帮忙，他被分配到国防秘书处。这是元帅创立的一个组织，职责是评价国家的备战状况。这是一份知识性较强的工作，戴高乐像知识分子一样工作着。